

# 炎黄文化研究

第五辑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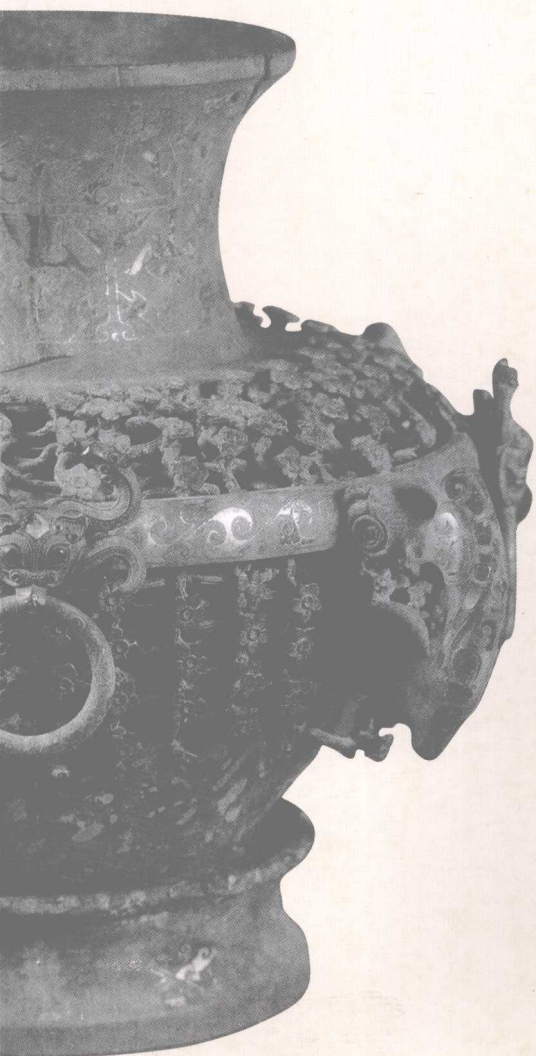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 大象出版社

主编 王俊义



# 炎黄文化研究

第五辑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王俊义

□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文化研究. 第5辑/王俊义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5347 - 4533 - 1

I. 炎… II. 王…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752 号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霍红琴 方 丽 牛志远

封面设计 王翠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http://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69 千字

定 价 31.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6202901

##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张岂之 方克立 石兴邦 韩伟 文选德  
主任 张文彬 孙天义 石玉珍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才 王俊义 冯广裕 曲英杰 刘宝才  
李尚英 何炳武 邵小强 耿相新 黄爱平  
梁绍辉 曹敬庄 曾雨农 漆永祥  
主编 王俊义  
副主编 王才 曾雨农 邵小强  
编辑部主任 李尚英

# 目 录

## 专 论

- 再论传统文化的性质与作用 ..... 丁伟志\1

## 炎黄二帝及其时代

- 近百年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高 强\19
- 农稷别考  
——关于神农、后稷传说的新探索 ..... 李根蟠\37
- 论炎帝与黄帝的兄弟关系 ..... 梁绍辉\46
- 再论姜炎文化 ..... 霍彦儒\55
- 炎帝族对于“大火历”的贡献 ..... 王震中\61
- 从文献中去寻找虞舜历史 ..... 吴荣曾\66

## 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 论齐文化 ..... 宣兆琦 贺 玲\70
- 闽台区域文化特征概论 ..... 陈支平\80
- 试论金王朝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贡献 ..... 洪仁怀\91

## 思潮与学派

- 中国修史传统与中国文明传承 ..... 瞿林东\96
- 生命完善的正途  
——论《周易》乾卦的“龙德”思想 ..... 张文修\108
- 庄子审美化的道德观 ..... 时晓丽\121
- 赵汧春秋学与公羊学的关系 ..... 郑任钊\129
- “世益降，物益备”  
——试论王夫之的进化历史观 ..... 胡发贵\143
- 论黄宗羲民本思想的理论价值 ..... 韩 锴\154

## 祭祀文化

- 颛顼、帝喾二帝及其葬地与祭祀考 ..... 张新斌\161
-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祭祀对象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 梁满仓\169

## 文化丛谈

对近代大国崛起的文化思考

——兼论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 ..... 于 沛\182

致力普及——落实中华文化当代价值的一个重要途径 ..... 钱 逊\195

## 文献整理与研究

试析《史通》的文献学成就 ..... 黄爱平\201

为天下人留一部利天下的书

——《黄宗羲全集》编校缘起及其特色纪实 ..... 吴 光\211

## 海外中华文化研究

关于《老子》思想体系的建构

——温诺登《〈老子〉的貌似混乱而实有条理》评说 ..... 张娟芳\222

中国 17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 ..... (俄)V. G. 布洛夫\228

## 中华学人

侯外庐与侯外庐学派 ..... 陈寒鸣\234

林耀华早期学术思想发凡 ..... 潘守永 张海洋\248

林耀华与中国的民族研究述略 ..... 张海洋 潘守永\257

## 书评与序跋

《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序 ..... 龚书铎\264

探索中华文明 研究颛顼帝誉

——《史记·五帝本纪》与《五帝时代研究》读后 ..... 任 清\266

解读千年古籍 注证华夏文明

——简评《山海经注证》 ..... 易小放\273

宝应刘氏与《宝应刘氏集》 ..... 王志娟\277

## 学术动态

“颛顼帝誉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 徐春燕\284

清史纂修缘起与现状述略 ..... 李尚英\292

# 再论传统文化的性质与作用

◇丁伟志

九年前在宁波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曾就近似的题目作过发言<sup>①</sup>,现在再来讲,固然新意无多,也只好叫它“再论”了。

这里说的传统文化,自然主要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

## 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何以成了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前提是先得回答:“在现实中传统文化有没有价值?”

传统文化在人类所处的任何时期,都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这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人生之初,面对的只能是一个既成的现实社会,而这现实社会又只能是世世代代积累而成。无论多么不得了的天才,也没有能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逃脱传统造成的这个既成现实。胡适当年提倡文学革命时说过:“说话要说现在的话,不可说古人的话。”于是章士钊质问道:不说古人的话,现在岂不就“无话可说”了吗?问得何其机智,胡适简直无法正面作答。试想,人生下来张口说话时,就能独创一种前无古人的语言吗?要是人人都各自独创一种语言,那人们还能交流吗?失去交流性能的“语言”怎么能算是语言?——当然,胡适当年所说的,无非是在讲语言文字应当有创新精神,不能人云亦云,全是陈词滥调。只是为强调革新的决心,把话说得不留余地了,犹如韩愈“唯陈言之务去”的现代版。

如果把文化的含义,不局限于语言文字、道德文章、学术艺术诸事,而是按现今流行的文化的广义定义,那么人间普世的事,直至衣食住行这样的生存方式,也一概是传统文化的赐予。如果硬要和传统的衣食住行方式一刀两断,那就只好走文明大退化的路,去做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野人了。

传统文化作用之不容置疑,就在于它的作用大到“人只能活在传统中”。人接受传统文化是被动的,无从逃避,别无选择。

<sup>①</sup> 《活着的传统》,已收入拙著《桑榆槐柳》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那么,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何以又成了问题呢?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被动地接受传统之赐的人,随着实践经验和文化知识的增长,对于传统的传承渐渐具有了主动抉择的能力。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对待传统主动抉择的能力,更会加速提高。所谓对传统的主动抉择能力,概括说来,无非一是对传统所有者可以有所选择,有所取舍;二是对传统所无者可以有所创新,有所增补。文化上的这种选择与创新,自然只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是在传承固有文明成果的同时来进行。但是,既然文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存在着选择和创新,那么也就证明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具体价值,随着时代的推移、环境的变迁而变异。时过境迁,人们就不得不对固有的传统文化,不断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价值重新评估。于是,传统文化对于后来人永远具有普遍价值的这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就一变而成为传统文化对于后来人在现实的生存环境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肯定传统文化具有无可代替的价值的前提下,人们必须对于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解剖,分辨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作用,从而决定对其区别对待。于是,在人类整个文明史上,传统文化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便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论不止的大问题。

任何人都不能不对前人留下来的文化遗存进行价值重估,即使是最忠诚的以继承传统为己任的文化巨匠也不能例外。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毕生使命的孔子,在“祖述”、“宪章”的用语中,已经表明了他对前人文化遗产的继承不是笼统地全盘采纳,而是有选择的。况且,他还更加明确地表态,在三代文明中,他着重推崇并以继承为己任的是三代文明高峰的周代文明,所以才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无疑又是对传统所作的一种选择。再进一层,孔子对于文化遗存的具体性能与价值,还作了褒贬有别的不同评估,也就是说,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采取区别对待的分析态度,传承其正确的合理的内容,用其所长,而摒弃其错误的、不当的内容,舍其所短。他明确表示,自己在对待文化遗产的取舍上,并非“惟周是从”,而是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乐,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姑且不论他老人家的价值标准是否有可以商榷之处,仅就主张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加以评估而决定取舍的立意而言,岂不大有今日之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意?至于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创造性贡献,更加是无须赘言的。他虽然自谦地表示自己仅仅是个“述而不作”的传统文化的阐释者,而事实上正是由于他在前人的文化基业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他才成就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代宗师。

在通常情况下,文明进程中发生的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如上述孔子对传统文化所作的分析、选择与创新那样,只会带来对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作用的否定,并不会造成对全部传统文化作用的通盘否定。或者说,这只是提出了在时过境迁之际“传统文化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并不等于提出了这时候



“传统文化还有没有作用的问题”。对于传统文化的作用,从整体上产生质疑,这只有在特殊的文化大背景下才会出现。大致说来,只有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群体自己的固有文化受到他种文化的强烈挑战而处于弱势颓势,面临着被取代被消灭的严重危机时,“自家的传统文化还有没有价值”、“还值不值得保存、继承和发扬”才会成为一道迫切的时代课题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

中华文化,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并没有遭遇过他种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更未曾面临被取代被消灭的威胁。自汉代开始的佛教的传入,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但是外来的佛教文化,固然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但是它并未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构成喧宾夺主的威胁;即使在统治者一味佞佛的时期,佛教文化至多也只能算是和中华固有文化持均势状态,平起平坐,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华文化的根基——何况还不断有排佛禁佛的风潮发生。只是到了近三百年(一说可以算到近五百年),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力、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和达到的整体水平,才愈来愈显著地落后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到了晚清,也就是19世纪的中后期,伴随着欧洲列强倚仗优势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强行入侵,欧洲近代文化才以不可阻挡的以强凌弱之势涌入中国。至此,在世界格局中,欧洲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的大势已洞若观火,无可回避。中国人无可奈何,不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必须面对这种外来的先进的文化向本国固有的但已处于落后状态的文化的挑战。有识之士为自强救国计,开始摆脱顽固守旧派“彼有枪炮,我有仁义”式的文化排外主张的干扰,试探着提出不同程度的学习“西学”之长的各种建策。那时候的这类学“西学”的意见,基本上都还小心翼翼地守在“中体西用”一类的框架内。不过激进者已有勇敢地对固有文化进行反省,进而力主“不耻师学”的。先是冯桂芬断然主张:“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sup>①</sup>后来到了清末实行“新政”时期,“力主西学”的严复则更加明快地提出“开民智”的主张:“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sup>②</sup>流亡海外的(主要在日本)爱国志士中,更有人奋起抨击中国固有的奴化说教,大声疾呼中国必须依照西方自由平等的观念,改造旧道德,“改造国民性”。“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压制”<sup>③</sup>,已成为当时先进人士的共识。温和之如梁启超,也慷慨陈词,说欲救中国,则必得“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

① 《收贫民议》,《校邠庐抗议》光绪戊戌本。

② 《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

③ 《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1901年6月10日)。

专 论 之脑质”<sup>①</sup>。在这些议论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业已完全无用而有害,是不是该全部改变或推翻的问题,显然是呼之欲出了。

民国创建,新旧力量间纷争更形激化。尊孔读经的说教,充当起反共和、复帝制的舆论依据。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文化启蒙运动——以原产自欧洲的人权平等、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和科学为灵魂的新文化运动,挟雷霆般的震撼力勃兴了。为论证建设新文化的必要,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激进民主主义的倡导者,发动了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猛烈批判。他们痛斥中国固有文化的弊端时,理论迅速走向极端,种种把中国旧文化说成一无是处的言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当时知名的新文化人士的著述中。概括说来,他们当时所持的“文化革命论”,是主张在中国实行文化上的推倒重建式的“除旧立新”,亦即无保留地引进以民主科学为精髓的新文化,全盘取代中国以纲常礼教为宗旨的旧文化。他们说,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如同冰炭水火之不能相容,因此中国只有以新代旧,换一个文化。为论证对旧文化实行改革的必要而推论出来的这种“文化取代论”,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口吻宣布要彻底废弃中华传统文化,自然在中国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平心而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当年放言消灭旧文化,实意无非是在故意把话说绝,来惊世骇俗,引人关注文化革新的必要。他们批判旧文化,着眼点实际上是放在批判维护专制主义和等级秩序的纲常礼教上。至于对固有文化遗产中具有价值的部分,无论是有关文学的、学术的,还是伦理的合理内容,他们这些原本具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的知识界中人,在提倡文化革新时,都不同程度地郑重其事表述过应当珍惜、研究和继承的意见,并没有一味主张“反传统”。何况在中国,张口得说中国话,落笔得写中国字,怎么也跳不出中华文化的圈子,说“新旧不两立”、“废弃旧文化”,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办法真正办得到的。不过,既然说出了那些贬低、蔑视中国固有文化的话,围绕着如何评估传统文化价值的问题,就无可避免地引起一波又一波的论战。上世纪前期所发生的“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优劣长短之争、“国故”与“欧化”之争、20年代东西文化“路向”之争、30年代“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都直接讨论到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价值乃至有没有价值的问题。以后由于政局的激变,这种文化上的纷争被冲淡了,但是认识上原本存在的分歧并未解决。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是有了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问题,才又浮出水面,并逐步升温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说到底,传统文化有无作用的这个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之所以忽而成了问题,只是由于人们对于传统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区。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后世会起怎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对传统文化性质的认识。

<sup>①</sup> 《中国积弱溯源》,《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

## 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延续与衍变的统一

传统文化对于后来的承受者,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统而言之,还是章士钊说过的那一句最为简捷:“旧为新基。”固然章士钊当年说这话是为反对新文化运动,文化守旧的情绪偏执到极端,连白话文也极力反对,可是无论如何都得承认“旧为新基”这句话准确地讲出了文化的一种本质属性。

文化之所以成为传承不歇的传统,就表明它具有内在的延续功能。也就是说,文化创造、文明成果的效益,不会只是暂时的,不会仅仅是在创造的当时当地起作用的;相反,其中必然包含着可以传诸后世,在后世依然能够发挥效益的内容。固有文化中的不同内容所具效益的长期性,当然因其具体性能的差异而会有所不同,会有强弱长短的差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有价值的文化创造,不仅必定包含着可以向后世传下去的成分,而且还可能包含着历经千百年而长盛不衰的甚至与一个民族的生存相始终的内容。更进一层说,人类文化史上的杰出建树,在人类社会中会具有永恒的价值。

至为明显的是,文化只能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前人的文明积淀,是后人文明发展的基础。有没有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厚不厚,对于后来文明发展的影响有着决定意义。人类文明的总趋势固然是日新月异地进步着,但是文化发展的定律,无疑是立足于继承才能发展,起步于模仿方能创新。基厚才本固,根深方叶茂。文化根基的厚薄,文化起点的高低,对于当事者来说,自是大不一样的。

传统文化具有无可置疑的延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是停滞的、一成不变的。我们有些学术界文化界的人士,往往把传统的中华文化有意无意地看作是一个具有固定的不变性质的文明成果。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一切传统文化,始终都是处在动态中。传统文化不是静态的事物,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处于连绵延续状态中的传统文化,始终又处在不停止的变化发展的状态中。

传统文化为什么是在不停地变化着发展着?简要说来,基本缘由无非两项:一是文化必然不断有流失,二是文化必然不断有创新。

文化的流失,从来是难以避免的。分析起来,造成文化流失的原因大致有三种。

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固有文化中总会有些内容过时了、失效了,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照搬照套了。古代视为金科玉律的,后世也不可能一概死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这条“圣训”,从清朝立国不就被打破了吗?“三年之丧”的礼数,“父母在不远游”的约定,这类载入《论语》的种种箴规,现在还具有人人都得遵守的约束力吗?更不必说列入“五经”的《礼》所罗列的大套礼仪,至

专 论 今尚有时效的,不知道还能找出万分之几?

二是固有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些为后人的实践和认识证明原本就是错误的内容。从天圆地方、天人感应、图符祥瑞、灾异妖术,到种种摧残人性的陋规鄙俗,不是都应该随着人类知识水准的提高而予以消除吗?“三寸金莲”,不也曾是流行了好久的可以算到文化范围中的中国民俗吗?怎么就长期不识其恶呢?无怪乎胡适曾经极其愤慨地说:“中国八百年的理学工夫居然看不见二万万妇女缠足的惨无人道!”<sup>①</sup>

三是不当的损毁或遗失。这样的状况,有的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有的是自然的原因造成的,也有对后人来说是原因不明者。天灾或疾病,会对人类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坏。愈是古代,人们抵抗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无疑就愈差,受到的损害也必然会愈大。至于人为的原因造成对文明的破坏,那在人类文明史上更是屡见不鲜。这种人为的破坏,一种是暴力的入侵,像蒙古灭西夏那样,把西夏这个国家灭亡了,把西夏独特的文字也废除了。如今只有少数专家还能辨识西夏文。对文化的人为破坏,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处于弱勢的落后的某种文化会被处于强势的先进的某种文化所同化,被取而代之,渐渐消亡。满族那样一个掌握了中国统治权二百六十多年的民族,长期接受汉文化,终于在清亡之后,把满族的语言文字基本上也放弃了,如今只剩下极少的专门学者还能认识满文文献。现在境内的人数很少的小民族,也还面临着本民族语言消失的危机<sup>②</sup>。

综合以上所说的三种情况来看,固然应当力求防止和避免那些不应有的破坏,但是在历史长河中某些固有文化的流失是必定会发生的。传统,不可能历经数千载而原封不动。

决定传统文化处于不停变化的动态中的另一原因,或者说尤为重要的原因,是人类文化必然会有不断的创新。文化创新之因,大致可以归为两端。

一是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文化必定会有新创造。前一阵子,有些学术界人士极力推崇“原典”的重要性,且不说“原典”该如何定义,就拿“四书”、“五经”和先秦诸子书算作中华文化的“原典”来说,强调其在中华文明中的突出重要的地位,自是绝对正确的,甚至可以说离开了这些典籍,就谈不上中华文化。可是,必须看到这些典籍在其诞生时也是新创事物;在这些“原典”问世之前,世上是没

---

<sup>①</sup> 《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引者按,胡适此处所用“二万万”的数字,用法是不恰当的。中国妇女缠足史既然长达千百年之久,那么受害人数自然该当累计,岂能按“四万万同胞”的一半计算。

<sup>②</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照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宗旨,从2001年起开展了“中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目前已调查了畲族、满族、土家族、裕固族、怒族、赫哲族等八种语言,同时对新发现的五十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实地调查。对这些濒危的文化遗产,如何进行抢救、保护和传承,是一项颇为繁重的研究工作。

有这些“原典”的。第二,这些“原典”问世之后,两千多年来,中华文明绝不是仅仅停留在教条式地重复、抄袭这些“原典”的水平上。“二十四史”,“原典”里有吗?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原典”里有吗?后世对“经学”的注解阐释,不是也日新月异,不断添加上许多原本的典籍中所没有的新意吗?必须看到,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文化传统的因袭和文化环境的塑造,而是具有充分的主动创造能力。王国维举出过汉代以降的五部巨著,誉之为“古今最大著述”,即:“汉则司马迁之《史记》、许慎之《说文解字》,六朝则酈道元之《水经注》,唐则杜佑之《通典》,宋则沈括之《梦溪笔谈》。”他给这样的“最大著述”所作的定性是:“一空依傍,自创新体。”<sup>①</sup>老先生定的这个标准,是不是过高过严,自可商榷。但是,毫无疑问,正是有赖于不断的独创性的文化建树,起源于远古的中华文明才在数千年间一直保持着活力与生机,没有变成只供人们把玩的古董。有鉴于此,陈寅恪在给王国维所写的遗书序言中,才特意强调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sup>②</sup>

二是不同派系的文化交流,必然催生出文化新成果。文化交流对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至为明显。取长补短,把我所未有而别人已有的文明成果拿过来为我所用,而无须自己再去备尝从头探索的艰辛,这就是创造性劳动的节约。况且,不同特色的文化派系间的交流,还会激发出新的文化创造的活力,亦即创造出交流双方原本所没有的崭新的文化成就。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到中国来,和中华文化交流,创造出哲理的、文学的、艺术的、世俗的种种文明新成果,其中固然包含着中国的和印度的固有文化的因素,但已绝非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简单相加之和,而是交流激发出的文明新成果。

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流失与创新,证明了孔夫子“损益”说的正确。在“因”的过程中,既不停地“损”一些,又不停地“益”一些,恰是传统文化经历着的常规(参看《论语·为政》)。如此看来,对于传统文化仅仅说到“旧为新基”这一层是不够的,还应当看到它同时又是无尽的“新陈代谢”的过程。文化史上的任何显学,也逃脱不了分化、变化的命运。“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

① 《牖轩随录·古今最大著述》,《王国维学术随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②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

专 乱”(《汉书·艺文志》)说的也是这种情况<sup>①</sup>。现在被大家奉为新儒家宗师的梁  
论 漱溟先生,在赤诚地赞颂“孔家的路”时,却不但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支持者,而且  
毫不含糊地赞同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和白话文。这和孔、孟、程、朱以维  
护君主政体的“君道臣纲”为最高使命的信念,当然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了。再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现今不是已经成为中国汉文的基本文体了吗?  
这也就是说白话文体已经成了中华文化的新传统。尽管现在流行的白话文中还  
包含着许多文言文的词语、典故,甚至还常常利用和援引一些古典文献中的名言  
佳句、精彩篇章,但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现代汉语基本的书面文体一事,业  
已不可逆转。老传统是传统,新传统也是传统,传统就在这样不停的新旧代谢中  
流动不息、损益不已。

传统文化只能是个过程——只能是个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实现延续与衍变统  
一的流程。认识传统文化的这种本性,才能清醒地估量传统文化的真实价值,不  
致陷于或宠新知而蔑旧学、或守陈规而拒创见的偏颇之两极。

## 传统文化是多元的复合体

现今世上存在的重要的文化体系,无一例外地都是多元的复合体。或者借  
用马克思对历史性质的定义,可以把它叫做“多样性的统一”。费孝通先生说,  
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文化多元,约含二义:一是指其起源、源头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源的;二是指  
其构成、成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

认识中华文化的多元复合性质,是清醒估量其价值的又一个决定性的前提  
条件。

固然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于远古时东亚人种的来源,还有本土说和外来说的  
种种见解,不过至今那还都只能算是一些证据不够充分的假说。至于中华文化的  
起源,无论从它在远古时期受到东亚大陆地理环境的制约而言,还是从它传承  
五六千年来的文化所独具的特色来看,都足以确证中华文化不是依傍外来文化,  
而是独立自成的文明体系。但是,如此说来,中华文化是不是起于一源呢?中国  
考古学界曾经有过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之争。持“一元”说  
者,认为中华文明只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持“多元”说者,则认为黄河中下

<sup>①</sup> 1999年12月,杨振宁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曾以宋儒的“天理”  
观、“心性”说来诠释中国文化的特性。我对此论不敢苟同,写文章讲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  
说,中国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程朱理学的“天理”观、“心性”说,代表不了中国文化的  
特性,也代表不了儒学的特性。两千年间儒学的变化大了,正如同孔孟代表不了程朱一样,  
程朱也代表不了孔孟。拙文发表于澳门理工学院的《中西文化研究》创刊号(2002年6月)。

游只是在某个时段上成为东亚大陆文明最高的地区,其实追溯其始,它仍是来自多种源头。有的学者说,中华文明也可以叫做东亚的“两河流域”的文明,即和黄河流域的文明并立着、大体平行发展着的,还有长江流域的文明;这两种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主干,二者的融汇便形成了华夏文明。有的学者说,华夏文明的源头之多,多如“满天星斗”,或者就像康熙时考察江河之源时所下的结论:“江源如帚。”近百年来的考古成就,已经足可以证实华夏文化起自多源一说,是符合历史真相的。就拿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文明来说,状况也相当复杂。从上游到下游,从马家窑到大汶口,从成都平原到太湖平原,都存在着远远超过两种的并非同源的远古文化遗存。至于北到红山,南至岭南,情况就更加复杂。何况,在漫长的岁月中,还有众多的文化融汇进来,宛如无数的支流汇入长江大河。曾经一度活跃于东亚这块大陆上的许多民族,连同他们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磨合,已经融为一体。再加上外来的西域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中华文化源头的多样性更是无从置疑。“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庄子·徐无鬼》)。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是内容无比丰富多彩的多元复合体,正可作如是解。

文化内部构成的多样性,当然并不是仅仅取决于文化起源的多元性。文化多样性的成因,应当说更重要的,是来自文化体系内部的人的创造性贡献。正因为人具有不停息的文化创新能力,所以即使是在同一地区、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其文化仍旧会是千姿百态、流派纷呈。历经数千年融汇而成一体的中华文化,无疑形成了内在的共同性、统一性,但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仍然始终包含着复杂的构成。不同民族、不同学派、不同教派、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的多种成分,水乳交融地汇集在一起,才构筑成大中华这一宏伟的文化大厦,并得以矗立于人世间垂数千年。总之,必须以开阔的眼光,充分认同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不管人们对其态度如何,黑陶彩陶、青铜白玉、甲骨简帛、诗书礼易、诸子百家、巫释道回、石窟摩崖、诗词曲赋、书画技艺、笔墨纸砚、农工医商、茶瓷丝绸、衣食住行、官制民俗等等,一路下来,直至近代的民主、科学、白话文、标点符号、百年来众多的科学技术新成就,以及在国内风行一时的各种主义,都成了现今的中国人和今后的中国人所承受着的传统。传统的中华文化,就是如此博大而庞杂的多元复合的文明体系。

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对于正确估量中华文化的功能和价值,具有关键意义。因为过去流行过、现今也还仍然在流行着一种将中华文化作单一的狭隘的解释的倾向。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的理论导向。最常见的是把汉族文化当作中华文化的全部(国外很长一段时间,就把中国问题研究叫做“汉学”),这当然不确切。汉族自然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决不可忘记中华民族是多民族构成的共同体。孙中山先生曾经讲过“五族共和”,如今已是“五十六族共和”了(还有些人数甚少的族群来不及作出鉴别)。汉族以外的各民族的文化,当然是中华文化的当之无愧的组成部分。何况汉族文化中,早

已吸收和融汇了大量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或看轻汉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直到如今任何人要学中国文化，还不只能是从学汉语、汉字、汉文入手吗？应当说由于历史的积淀，汉族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只是不要把它错认作中国文化的全部而已。

既然不可简单地把中华文化只归结为“汉学”，那就更加不能把中华文化归结为“汉学”中的一种学说“儒学”。把“国学”解释为“儒学”的这种论断，目前有点纷纷扬扬，但是无论如何它也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有的学者说的，不管你怎样估计儒学的价值，它也“只是中华文化一部分的一部分”<sup>①</sup>。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的地位无疑是很显赫的。截止到中华民国成立，两千多年里儒学享受着“独尊”的光荣。它不仅是庙堂之学，是官学，而且儒家的著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社会上最为普及的学文化、学知识、学做人道理的教科书。虽然近百年来儒学屡屡遭劫，但是理应承认儒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功能仍然不可抹煞。即便在孔子的“素王”和“至圣”的尊荣已被废除之后，儒学经籍也仍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极而言之，时至今日，如果一点也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接受一些儒学的学识、道理和语言文字，那就恐怕无法看懂中国文，无法说通中国话，没有资格做一个合格的中国文化人。说这样的话，大约算不上危言耸听。

话又说回来，我们尊重儒学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价值，并不等于把它尊崇为中华文化的独一无二的内容和主导一切的灵魂。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学，也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在此之前当然就没有儒学（固然也有古“儒”为其秉承，但那算不上已经建立起学说或学派）。也就是说，儒学问世之前中国早已有当世相当发达的文化，那文化当然不属于儒家<sup>②</sup>。春秋战国时期，儒学虽成显学，但也只是百家之一，况且一直不受各国当权者重视，其道并不行时。秦朝尊法，汉又承秦制，至多把儒学拿来装装门面。直到董仲舒提出“独尊”的建策，儒学的地位才一变而具高居庙堂之上的荣誉。可是不能不注意的是，建策“独尊”的人，不但把儒学明确地称为“儒术”，而且还掺杂进大量的阴阳讖纬的说教，并不符孔孟学说的本貌。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批准“独尊”的，不是“文帝”，而是穷兵黩武的那个“武帝”；至少可以肯定，汉武帝批准“独尊儒术”，只不过是使臣下和庶民们遵守，以求变得对君主更加忠诚和顺从而已，至于他本人却还是为所欲

① 早在道光年间，龚自珍就在所作诗里直言中国文化非儒家独霸之史。诗曰：“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诗见龚氏于道光十五年所作《古体诗十五首之十》。词语实在犀利，连现存的“儒”究竟是不是原来的“九流之一”的“儒”，他也表示怀疑了。

② 朱熹为推崇孔子，曾经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语见《朱子语类》，但也有人说此乃董仲舒语），后来便有人讥笑说：“怪不得三代时人都秉烛日游！”



为,并没有想也去受“独尊儒术”的约束。自此而后的两千多年,儒学也并未能一统中国文化的天下。上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柳诒徵在《学衡》上发表文章,反驳《新青年》派对孔子的批评。这篇文章行文十分奇特,大意是说,彼等对孔子的批评是很浅陋可笑的;而其可笑处,倒不在于对孔子的诋毁,而在于崇信孔子太过。其实中国数千年来孔教根本没有认真实行过,唯赖极少数书呆子才把孔子之道不绝如缕地勉强延续下来。得志于社会、掌权于国家的人,至多不过是拿孔教当块金字招牌,欺人耳目罢了。他的结论是,中国的病根,不在于奉行孔子之教,而是在于根本未能奉行孔子之教<sup>①</sup>。这结论固然很难令人赞同,可是所说历来的当权者并未真正实行过孔子之道,确是实情。试想,两千多年间,高居九五之尊的君主们,崇道者多有,佞佛者也有,唯独真心实意地崇信儒学的却是凤毛麟角,千百帝王里也难挑出一个来。正像有人说的,历代君王们相信并奉行的是“权谋文化”,而不是儒家的“以德治国”。至于世代相传的文化事业中,儒学显然也未能独霸。就拿文学来说,试想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究竟有多少是纯粹按照“文以载道”的精神传布儒家之道的?《西游记》、《水浒传》固不必说,一部《红楼梦》,精神寄托的最高象征,还不是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吗?正像不能仅仅用易、仅仅用禅、仅仅用老庄、仅仅用五行八卦、仅仅用太极阴阳来诠释中华文化的内容与精魂一样,也不能仅仅用孔孟、仅仅用程朱来诠释中华文化的内容与精魂。

近百年来,西方近代文化大规模输入,更造成了中华文化多元的新特色。如今西方文化的相当多的内容,已经融入中华文化当中,而且人们也没有可能再把它从今天的中华文化中剔除出去。还是那位批评新文化运动不遗余力的吴宓说得不错,在现代中国,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理应是在两者间撷精取粹,融会贯通,熔铸一炉,以图“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sup>②</sup>。这就是说,时至今日,再来谈中华文化,就必得有勇气承认它已经汲取并包纳了众多西方的(以及东方的)外来文化的内容。上世纪30年代,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反对“全盘西化”的名义下,提倡建立排除外来文化的土生土长的中国本位的文化<sup>③</sup>。在文化问题上,提出这种建设绝对排他的“纯之又纯”的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当然是既不能说清楚中国文化的历史实情,也无法应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并且与日俱增的多样性,并没有妨碍中华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一体性。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多的学派教派,居然没有构成水火不容的敌对之势?(其间矛盾、争辩乃至尖锐冲突,在历史上当然是屡有发生

① 《论中国近世之病源》,《学衡》1922年第3期。

② 《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③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1935年第1期。